

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KENNETH A. OYE

[美]肯尼思·奥耶 编

田野 辛平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KENNETH A. OYE

[美]肯尼思·奥耶 编

田野 辛平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美)肯尼思·奥耶
(Kenneth A. Oye)编;田野,辛平译.—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22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ISBN 978-7-208-17111-4

I. ①无… II. ①肯… ②田… ③辛… III. ①国际合
作-研究 IV. ①D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243810 号

责任编辑 王 冲

封面设计 小阳工作室

东方编译所译丛

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

[美]肯尼思·奥耶 编

田野 辛平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C 座)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246,000

版 次 202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7111-4/D·3769

定 价 69.00 元

序 言

解释和促进国际合作的问题涵盖了政治经济学领域和安全研究领域中的诸多重要问题。但是,政治经济学家和安全分析家之间的合作是有限的。本书的撰稿人试图整合20世纪80年代早期鼓舞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论点,运用统一的框架分析这两个领域中的重要案例,并寻找理论与经验证据之间的不一致以推动理论创新。

为了尽可能保持智识上的一致性,本书撰稿人一开始就采取了协作的方式。在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于1984年3月和8月主办的专题研讨会上,撰稿人陈述和讨论了分析框架、各章提纲和初稿。此外,撰稿人在本书每一个发展阶段上都对各章提供了广泛的评论。为了尽可能减少圈内思维局限性带来的错讹风险,我们以若干方式寻求局外人的批评。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1984年3月的研讨会上评估了我们的计划。格伦·斯奈德(Glen Snyder)和其他与会者在1984年美国政治学年会上评论了各章的初稿。乔安妮·戈瓦(Joanne Gowa)在1985年1月为整部书稿提供了评论。最后,为了尽可能减少格式上的不一致,埃尔斯贝特·莱温(Elsbeth Lewin)在1985年春季编辑了书稿。根据这些实质性的和格式上的建议,各章都作了大幅度修改。

编者和作者在此衷心感谢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和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没有这些机构和资金的支持,本书的完成难以想象。

肯尼思·奥耶
普林斯顿,新泽西
1985年9月

作者简介

肯尼思·奥耶(Kenneth A.Oye):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邓肯·斯奈德尔(Duncan Snidal):芝加哥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和政治学系副教授

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

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乔治·唐斯(George W.Downs):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

戴维·罗克(David M.Rocke):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公共卫生科学系教授

伦道夫·西韦森(Randolph M.Siverson):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政治学系教授

约翰·科尼贝尔(John Conybeare):爱荷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查尔斯·利普森(Charles Lipson):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和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教授

目 录

序言

作者简介

第一部分

理论与方法

解释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假说与战略

肯尼思·奥耶 /3

国际政治的博弈理论

邓肯·斯奈德尔 /26

第二部分

在安全事务中的应用

从均势到协调：国际安全合作研究

罗伯特·杰维斯 /59

1914年，合作为何失败？

斯蒂芬·范·埃弗拉 /80

军备竞赛与合作

乔治·唐斯 戴维·罗克 伦道夫·西韦森 /122

第三部分 在经济事务中的应用

贸易战：英国—汉萨、法国—意大利和霍利—斯穆特
冲突的比较研究

约翰·科尼贝尔 /153

英镑—美元—法郎三角：货币外交 1927—1937 年

肯尼思·奥耶 /179

银行家的困境：主权债务重新安排中的私人合作

查尔斯·利普森 /204

第四部分 结论与启示

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达成：战略与制度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 罗伯特·基欧汉 /233

译后记 /260

第一部分

理论与方法

解释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假说与战略

肯尼思·奥耶*

一、导 言

国家存在于持久的无政府状态中。主权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不会受到集中权威的限制。这种共同的条件产生了多样的结果。国家间关系集中表现为战争和协调、军备竞赛和军备控制、贸易战和贸易休战、金融恐慌和金融援救、竞争性贬值和货币稳定。国际关系中集中权威的缺乏有时会阻碍共同目标的实现。因为国家不可能将对自身行为的最终控制权交给一个超国家的主权者，它们不能保证将会遵守其诺言。违反诺言的可能性会阻碍合作，即使合作会使所有国家受益。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国家的确在无政府状态下通过合作实现了共同的目标。虽然没有任何最高的国际权威，国家经常约束自身行动以促进相互受益。虽然没

* 我衷心感谢杰夫·弗里登(Jeff Frieden)、拉尔夫·金斯伯格(Ralph Ginsberg)、乔安妮·戈瓦(Joanne Gowa)、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戴维·莱克(David Lake)、蒂莫西·麦基翁(Timothy McKeown)、保罗·夸克(Paul Quirk)、阿瑟·斯坦(Arthur Stein)及本书其他撰稿人提供的评论。

有国际主权者来实施协议条款,国家能通过默契式合作、正式的双边和多边谈判以及国际机制的创建来实现共同的利益。问题在于:如果国际关系既近似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又近似于洛克式的市民社会,为什么合作在一些情况下会实现,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不会实现?¹

这一专题论文集的作者既从解释层面也从建议的层面提出了这个永恒的问题。第一,哪些环境条件便于出现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鉴于缺乏集中权威来保证对协议的服从,情势的哪些特点鼓励或允许国家约束自身的行动以实现相互受益?情势的哪些特点阻碍合作?第二,国家采取哪些战略来改变它们面对的环境以促成合作的实现?政府并不必然接受给定的环境。情势中对合作的阻碍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有意识的矫正?国家能够通过何种更高层次上的战略来创造合作的前提条件?

解释和促进国际合作的问题涵盖了政治经济学和安全研究领域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然而,由于习惯使用的术语不同,具体的应用不同,两个领域之间无法进行结论上的比较。在本书中,源自初等博弈论和微观经济学而形成的统一的分析框架贯穿于国际安全和经济事务的案例。运用严谨抽象的博弈论和微观经济学具有几个优点²:第一,表面的差异经常模糊两个领域中问题、解释和建议的类似性。通过基本概念的化约,博弈论和微观经济学要素的运用使我们得以辨识这种类似性。第二,财富和福利政治与战争政治之间的固有差异会产生不同的解释和建议。一种统一的分析框架有利于明确辨别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之间在程度、原因和前景上的差异。第三,知识的不均衡发展会产生不同的解释和建议,一种统一的分析框架便于有用的概念在两个领域中相互转换。³

在这篇导言中,我提出三个环境维度,既作为对合作的大致解释,也作为促进合作的长期战略目标。本章包括三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定义了一个维度,解释该维度何以有助于说明合作和冲突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发生,并检验促进合作实现的相关战略。

在题为“报偿结构(payload structure):共有偏好与冲突偏好”的部分中,我讨论了报偿如何影响合作的前景,并提出了通过改变报偿来改善合作前景的战略。正统博弈理论家通过划分定序博弈的类型来确定占优战略(optimal strategy),他们日常的洞见提供了讨论的起点。⁴安全研究、微

观制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近期的文献提出了改变报偿结构,进而改善合作前景的战略。⁵

在下一个题为“未来的影响:单轮博弈与重复博弈”的部分中,我讨论了持续的互动前景如何影响合作的可能性;⁶检验了回报战略(strategies of reciprocity)何以在重复条件下提供实现合作的直接路径;⁷并提出了延长未来影响(shadow of the future)的战略。⁸此外,这一部分显示,辨别和控制能力——区分他方合作和背叛的能力以及采取同类行动加以回应的能力——会影响回报战略的力量,并提出了改善辨别能力的战略。⁹

在第三个部分“参与者数目:两人博弈与多人博弈”中,我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数目的增加,合作会变得更加困难,提出了在多人(N -actor)情势下促进合作的战略,并提供了通过将行为体数目减少到实现共同利益的程度以促进合作的战略。博弈理论家和垄断理论家很早就注意到,随着数目的增加,合作将变得更加困难。他们的洞见提供了讨论的起点。¹⁰政治经济学的近期著作强调在多人情势下促进合作的两种战略:机制功能主义者提出了在大数目行为体条件下增加合作可能性和稳固性的战略;¹¹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特别讨价还价分析者则建议,双边和区域分解战略可将行为体数目减少到实现某些共有利益的程度,当然这也同时减少了巨大的合作收益。¹²

上述每一个环境维度既作为对合作的解释,也作为促进合作的战略目标。本章的结论部分提供了测试这些基本解释和战略的路线图。本书将这一共同的分析框架应用于经济和安全事务中的案例,并寻求这些案例在合作的发生率、原因和前景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作者希望这样做有助于深化对国际合作的理解。

二、报偿结构:共有偏好与冲突偏好

在给定轮次下的报偿结构——相互合作(CC)相对于相互背叛(DD)的收益、单边背叛(DC)相对于无偿合作(CD)的收益——是分析合作问

题的根本。这种观点依次包含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报偿结构如何影响合作的重要性。更狭义地讲，在什么情况下合作——根据有意识的政策协调来定义——对实现共有利益是必要的？第二，报偿结构如何影响合作的可能性和稳固性？第三，国家通过何种战略来改变报偿结构以增加合作的长期前景？

在转向这些问题之前，先简单考虑一下报偿结构某些有形和无形的决定因素。安全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文献检验了军事力量结构和信条、经济意识形态、货币储备规模、宏观经济环境以及诸多其他因素在国家评估其自身利益中的效用。在《安全困境下的合作》一文中，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解释了进攻性军事技术和战略的扩散何以能够增加背叛的报酬，并因此减少合作的前景。在《国际机制、交易和机会：战后经济秩序中的内嵌自由主义》一文中，约翰·鲁杰(John Ruggie)展示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扩散如何增加了相互经济开放相对于相互封闭的预期收益，并因此减少了非对称背叛相对于非对称合作的预期报酬。在《企业和关税机制变革》一文中，蒂莫西·麦基翁(Timothy McKeown)表明了商业周期的低迷阶段如何改变了国家对贸易保护的偏好，并且因此减少了相互开放相对于相互封闭的预期收益，并增加了非对称背叛的预期报酬。¹³

在本书中，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论文和肯尼思·奥耶关于20世纪30年代货币冲突的章节，强调了意识形态和知觉因素对国家偏好的决定作用。罗伯特·杰维斯关于体系战争结束后协调的出现的论文阐明了报偿的国际结构因素。约翰·科尼贝尔(John Conybeare)关于贸易战的比较研究、肯尼思·奥耶关于20世纪30年代货币冲突的研究和查尔斯·利普森(Charles Lipson)关于银行家困境的研究，检验了报偿结构中的宏观经济因素。乔治·唐斯(George Downs)、戴维·罗克(David Rocke)和兰道夫·西韦森(Randolph Siverson)在其关于军备竞赛中的合作的论文中考察了报偿结构的国内结构因素。报偿结构成为认知的、国内的和国际的结构因素与国际合作之间的干预变量。

1. 报偿结构与合作

报偿结构如何决定合作的重要性？更狭义地说，在什么情况下，合作——根据有意识的政策协调来定义——对实现共有收益是必要的。如果存在共有收益，行为体会认为相互合作比相互背叛更可取。因为协调对于实现共有收益是必要的，行为体必然认为单边背叛比无偿合作更可取。这些偏好顺序是和我们熟知的“囚徒困境”、“猎鹿”和“胆小鬼”博弈相一致的。实际上，因为合作是可取的但非自动的，这些博弈已经不成比例地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在这些情况下，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约束自己的行为以实现相互收益，而不诉诸最高集中权威的能力，这对共同利益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

许多国际情势并不符合这些类型的博弈。第一，考虑一下实现共有利益并不需要合作的情形。如果行为体认为无偿合作比单边背叛更可取，就没有欺骗的动机存在。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而不管他方如何行动，将会自动导致共有收益。例如，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在经济学家中比在贸易官僚中更为普遍——相信无偿开放比单边保护更可取。自由主义者相信，不管他方如何行动，开放都是最好的。在一个由纯粹自由主义者构成的世界中，实现开放并不需要政策协调。在这样的情势下，利益是完全和谐的，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能力与共有利益的实现无关。¹⁴

第二，考虑一下通过合作也不能实现共有利益的情况。如果至少一个行为体认为名义上的相互背叛比相互合作更可取，政策协调就不能导致共有收益，“合作”一词将无法适用。对称的和非对称的僵局博弈（games of deadlock）属于这种类型。例如，如果美国和苏联都认为军备竞赛比军备控制更可取，冲突将不可避免。再考察一个贸易中的例子：自给自足政策的信奉者认为相互保护比相互开放更可取，因此，在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和自给自足的信奉者之间谈论合作毫无意义。在和谐盛行的时候，共同利益的实现并不需要合作。当僵局出现时，“合作”一词毫无意义，冲突不可避免。无论是和谐还是僵局都无法吸引博弈理论家的充分注意，因为合作和冲突的结果可以直接地和简单地从报偿结构中推导出来。

和谐博弈和僵局博弈在本书中起到什么作用呢？在诊断课上，医学专业的学生被教导：“当你听见马蹄声，先想到的是马，而非斑马。”哈里

森·瓦格纳(Harrison Wagner)向国际关系分析家提供了类似的建议。¹⁵他警告说,“猎鹿”、“胆小鬼”和“囚徒困境”经常并不适于摹画国际情势。当你观察冲突时,在困惑于为什么共有利益未实现之前应先想到僵局,即缺乏共同利益。当你观察合作时,在困惑于国家为什么能够抵制背叛的诱惑之前应先想到和谐,即背叛不能带来收益。通过将大量注意力投向对报偿结构的详细说明,作者们试图注意到上述的警示。

在一系列博弈中——包括“囚徒困境”、“猎鹿”和“胆小鬼”——合作对实现共有利益是必要的。报偿结构如何影响在这些情势下合作的可能性和稳固性呢?“囚徒困境”与“猎鹿”或“胆小鬼”相比,合作更难实现。为了理解为什么如此,通过链接其名称起源的说明性故事来考察每一个博弈。

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两个囚犯具有犯罪嫌疑。当局只持有少量指控所需要的证据。如果两个囚徒互不揭发,两人都会因仅获少量指控而被轻判(CC)。如果一个囚徒揭发,而另一囚徒沉默,滑头将被释放(DC),而傻瓜将被判重罪(CD)。如果两人相互揭发,两人均获中等处罚(DD)。每一个囚徒的偏好顺序为 $DC > CC > DD > CD$ 。如果囚徒预期仅仅博弈一次,每个囚徒都将选择相互告发而非沉默,不管其他的伙伴选择做什么($DC > CC$ 和 $DD > CD$)。滑头报偿的诱惑和傻瓜报偿的恐惧将使单轮囚徒困境走向相互背叛。不幸的是,如果两个囚徒都按这一推理行事,他们将会遭受主要的指控而获致中等处罚。而合作却可以使其仅因次要的指控而获致轻判($CC > DD$)。在单轮囚徒困境中,个体的理性行动产生了集体的次优结果。

猎鹿(Stag Hunt) 一群猎人围捕一只鹿。如果所有人相互合作来捕鹿,所有人将会吃得很好(CC)。如果一人背叛去追逐路过的野兔,鹿会逃走,背叛者得到少量食物(DC),而其他人一无所获(CD)。如果所有人都追逐野兔,所有人都有机会捕获野兔,从而获得少量食物(DD)。每个猎人的偏好顺序为 $CC > DC > DD > CD$ 。丰美鹿肉相对于其他所有结果的共同利益有力地减轻了背叛的诱惑。然而,因为到手的野兔好于逃跑了的鹿,只有在每个猎人相信所有猎人会合作的情况下,才能确保合作。在单轮的猎鹿博弈中,保护自己免遭他人背叛伤害的背叛诱惑被鹿

胜过兔这一强大的偏好抵消。¹⁶

胆小鬼(Chicken) 两个司机从相反方向驶向路中心。如果一人转弯,而另一人没有转弯,第一个人将得到胆小鬼的污名(CD)。而第二个人将被看作英雄(DC)。如果双方都不转弯,他们将遭致迎头相撞的惨祸(DD)。如果双方都转弯,每一个人的名誉损害都是有限的(CC)。每个司机的偏好顺序为 $DC > CC > CD > DD$ 。如果每个司机都认为对方将转弯,每一个司机将为背叛所诱惑,从而继续驶在路中心。做一个活着的英雄好于做一个活着的胆小鬼。如果双方都抵挡不住这一诱惑,背叛将导致相撞。由于担心对方不会转弯,这就减少了在路中心对峙的吸引力。在单轮胆小鬼博弈中,单边背叛的诱惑为相互背叛的恐惧所抵消。¹⁷

在非重复博弈中,只有定序的偏好起作用。在单轮博弈的情况下,依序而定的博弈类型中定距层次上的报偿并不能够(在理论上)影响合作的可能性。在上述说明中,占优战略的讨论并不取决于报偿之间的数量差。然而,CC和DD之间与DC和CD之间数量差即使没有精确的衡量,亦可大可小和可增可减。结果价值上数量差的变化会通过两种路径影响合作的前景。

首先,与结果相连的值的的变化能够将情势从一种定序的博弈类型转化为另一种博弈类型。例如,在《安全困境下的合作》中,罗伯特·杰维斯描述了在相互合作的收益相对于出自不当利用的收益有所增加时,较困难的“囚徒困境”如何演化为较少挑战性的“猎鹿”。他将包偿结构与进攻和防御主导的传统概念联系起来,将进攻和防御主导与技术 and 信条转换联系起来。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玛丽·帕特·威廉姆斯(Mary Pat Williams)和唐·巴巴伊(Don Babai)强调了知觉一致在技术合作中的决定作用。关于技术的本质和效应的共同观念的扩散提高了合作的预期收益,减少了出自背叛的预期收益,有可能将某些“囚徒困境”转化为和谐。¹⁸

其次,在重复博弈的情况下,在给定类型的博弈中,报偿间的数量差是合作的重要决定因素。出自相互合作的收益(CC—DD)越多,出自单边背叛的收益(DC—CD)越少,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在重复博弈的情势下,CC和DD之间与DC和CD之间在当下和未来轮次上的数量差影响当下合作的可能性。这一点在“未来的影响”部分将详细讨论。

2. 改变报偿结构的战略

如果报偿结构影响合作的可能性,那么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通过矫正报偿结构来改变情势,进而增加长期合作的可能性?这一部分开始所讨论的报偿结构中的许多有形和无形决定因素可以通过单边、双边和多边战略来进行有意识的矫正。在《安全困境下的合作》一文中,罗伯特·杰维斯提出了通过单边战略改变报偿结构的具体建议。采购政策会影响合作的前景。如果一个超级大国认为采购防御性武器比采购进攻性武器更可取,就会减少它从突击实现的不当利用中获得的收益(DC),减少对手对不当利用的恐惧(CD)。联盟成员经常采取措施将部队部署在存在纠纷的边界来增加合作的可能性。一个国家将部队作为人质加以使用,目的在于减少自己从背叛中获得的报偿——减少出自不当利用的收益(DC)——因而使其伙伴更少可能采取防御性的背叛。协议公开化减少了与背叛协议相联系的报偿,并因此减少了出自不当利用的收益。对国际关系的这些看法和微观经济学中近期的发展相类似。奥立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认为,企业所采取的单边和多边技巧可以减少不当利用的收益来促进企业间合作。他区分了与遵守协议相联系的专用成本和非专用成本。专用成本,例如专门的训练、机械工具和工程建设,并不能在协议破裂后追回。当缔约方陷入较高的专用成本时,背弃承诺将会导致明显的损失。因此,企业可以通过获取专用资产作为可持续合作的抵押来减少出自不当利用的收益。非专用资产,比如通用的卡车和飞机,即使协议破裂也是可挽回的。企业可通过最大化非专用资产的使用来减少对被不当利用的恐惧,但是这种资产不能作为抵押减少来自不当利用的收益。¹⁹单边战略可以通过减少被不当利用的成本(CD)和出自不当利用的收益(DC)来改善合作的前景。企业间合作的新文献间接地提出了一个国际关系中的老问题,即促进合作的单边战略的成本问题。

在很多情况下,限制自己从不当利用中获益的单边行动会增加自己被别国不当利用的脆弱性。例如,一国如果允许比较优势部门的扩张和无效率部门的清理就会减少从自由主义国际经济规范中背叛的收益。因为专用化的经济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抵押,这种战略无疑增加了国家对自由主义承诺的可信性,但是它也有另一效应,即增加了这一国家对他国